

第八级人

李文珊



第八级人

李文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 八 级 人

Di ba ji ren

李 文 珊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32000 字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90

ISBN 7-5302-0188-3/I·185

定 价: 3.00 元

序

尧山壁

文珊同志的小说集《第八级人》让我写序，使我愕然。一般做序的惯例是前辈为后辈写，上级为下级写。文珊同志是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又是受人尊重的老作家，我岂能不知深浅反来做序！但是文珊同志真诚友善，一再坚邀，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放下电话机，我觉得文珊同志的决定又是很合乎他的性格和为人的。他绝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那样威严自重，难以接近。恰恰相反，凡是接触过他的同志，无不为他平易近人、诚挚谦虚的态度所感动。他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感觉在人民群众中间比在机关还自然些。在文艺界更是广交朋友，尽量多看他们的作品。自己的文章也常常征求大家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使得我们在他面前能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即便是幼稚的想法也敢于拿出来，因此每次见面都受益匪浅，可见文珊同志让我做序并非偶然。

文珊同志的文学生命与共和国同龄，从1949年12月在山西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担谷》算起，到1989年《长城》第三期

《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问世，恰好是40年。40多年来他在山西工作10年，西藏27年，回河北4年。丰富多彩的经历让人羡慕不已，特殊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特殊的文学宝藏。

文珊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40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仅仅精选出16篇。篇目编排也颇费心思，采取由近及远的方式。我揣摸意在回头看，返观自己漫长的创作历程。40年崎岖文学之路，16座大小“山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总起来山势越来越高，风光越来越好。其中《前梁庄》、《双生女儿》、《八十三搬家》、《爱管闲事的老人》、《第八级人》、《三等世家之子》、《多龙小传》等景色尤佳，《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则是最高峰。我想这山系的主人是足以自慰的，连我这旁观的游人也替他高兴。

这16座山头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大体以1976年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为界。

集子里的多数作品取材农村。选择即意义，它取决于作家的生活体验与审美情趣。

文珊同志创作初期便显露出优良的艺术气质和表现才能。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北方大地的眷恋，对“世界屋脊”的渴慕，传递着浓郁的人民意识。农民的喜怒哀乐声息可闻，各种性格生动鲜活，风俗民情跃然纸上。尤其是他的语言，格调清新，节奏明快，写山西有一口十足的“山药蛋”腔儿，写西藏有一股地道的“酥油糌粑”味儿，口语俚语俏皮话信手拈来，自然平易中带一种哲理意味和幽默色彩。他歌颂新人新事，笔下的人物和时代一起成长，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憧憬未来，也深得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真传，写敌我斗

争，也写先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冲突。两个方面都写得纯净、明快，有一种淳朴的民俗美。

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是富有强烈的真实性和显明的倾向性。一个时期的文学主潮常常深刻地影响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美学观的形成，作品必然胶合着历史的印迹。但是作家的作品除了历史因素之外，还有个人因素。由于文珊同志比较清醒，忠于生活，体察民情，吃透了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从生活真实出发，往往可以不同程度地克服时代的局限性。他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的八十三、阿爸多杰，还是反面的铁帽秀才和小疯僧，不拔高不矫情，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感觉，没有多少“政治化人情”的味道，多数都能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的生命，有比较充足的生活依据。所以他的小说曾多次被移植舞台，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新时期以来，文珊同志的创作突破了原来的政治视觉，拥抱更加广阔的生活，冷峻地思考社会，作品焕发出一种时代的活力。

作家与农民一起反思，在和农民政治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探索农民的命运。通过山羊胡子（《顺流而上》）、多龙（《多龙小传》）以及《船客》里形形色色人物面貌的勾勒，特别是他们的觉醒，有力地揭示了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农民开始挣脱精神枷锁，恢复人的尊严。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普通的农牧民，不具有多么高的思想光辉和精神力量，但是透过他们心灵的历程和深层意识的冲突，可以感觉到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流正在高原农村涌动、奔流着，

这正是我国农村改革历史大潮的深刻反映。似曾相识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发现山羊胡子不是《八十三搬家》里的八十三，多龙不是《爱管闲事的老人》里的阿爸多杰。作家正以新的目光观照农村，写人写人生，写农民沉重的精神负荷，写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由于主题的深化，也带来思维的开拓、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变化和探索，有人说《船客》就吸收了意识流的手法。这一切标志着作家对人和文学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与此同时，作家的思考也开始超脱土地，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西藏人民的命运，并由此一下子照亮了他的小说境界，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三等世家之子》塑造了一个贵族出身的藏族知识分子邦色的形象，他艰难的思想历程表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也表现了西藏所处地位的复杂性。《第八级人》中的“理想之王”巧格桑，《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中的主人公，是新时期文学中罕见的艺术形象。他们不是土的李有才，也不是洋的荷马，是藏族精神文化的典型。巧格桑诅咒黑暗、歌唱光明，是理想的现实人。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是巧格桑的提高和升华，有点神秘色彩。作家塑造人物的灵魂，用人物的灵魂去影响民族的灵魂。

《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在艺术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做直线因果关系的反映和简单的是非评价，而是对生活做整体把握和多层次地开掘，给读者多方面的审美思考。致力于人物心理、思想、性格多层次的表现，赋予他们多方面的内容，因而比较含蓄，包容着深厚、多样的思想主题。二是重点挖掘民族文化心理，探讨民族文化价值的趋向，把人物

放在纵的历史变革和横的社会现象中描写，既表现了藏族文化积淀的历史过程，又表现历史与现代文化的交叉，人物与时代、文明与愚昧、道德与进步的冲突。人物找到了恰当的座标，因而站立得扎实。由《第八级人》开始的艺术高度，生长至此，结出了完美的果实。

文珊同志集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做为从基层锻炼出来的政治家，他有丰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心明眼亮，有丰富的直接经验，而这些正是文学家最重要的素质和基本功。做为文学家，他善于细心观察、思考，善于了解情况、发现典型，讲究斗争和教育方式，而这些又反过来对政治工作大有补益。只是他太忙了，几十年如一日地把精力奉献给了革命事业，难得有点滴空隙考虑文学创作。但是文珊同志时刻不曾忘记文学，从他为数不算多的散文、小说里看到了他深沉而机智的品格和不尽的才华，他的艺术生命还正年轻精壮。做为文珊同志的一名部下和学生，我期待着他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写给人民，写给历史。

1990.2.26

目 录

序·····	尧山壁 1
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	1
三等世家之子·····	31
多龙小传·····	44
船客·····	58
顺流而上·····	73
长袖善舞·····	77
第八级人·····	92
绵羊姑娘·····	105
爱管闲事的老人·····	115
两代人之间·····	126
双生女儿·····	131
八十三搬家·····	144
卖棉花·····	153
前梁庄·····	159
互助·····	188
担谷·····	197
后记·····	200

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

一

老辛这次到横断山区，任务是普查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其中的重点调查对象，是名震三江流域的四郎翁堆。那天，他兴致勃发地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来到四郎翁堆的家乡银杏沟时，却大失所望。人们说，四郎翁堆在十六年前已经去世，连他原来的住房也已荡然无存。这真像是在牛皮包上扎了一锥子，好不令人泄气！

又累又饿的老辛，坐在村中间靠墙的一排卵石上垂头丧气，无所适从。正在这时，一位手拄拐杖、一瘸一拐的藏族老人向他走来。老人捋着飘拂在胸前的浩然银须，乐呵呵地说：“远方来的客人，辛苦了！人死不得再生，四郎翁堆完成了他的事业，已去了西天极乐世界，要见他，可就是在清水里提炼酥油，办不到了。”稍微停顿一下，老人接着又说：“四郎翁堆虽然死了，但他的‘影子’还在呐，何不去找找他的‘影子’呢？”

听老者这么一说，老辛眼睛又亮了起来，急切地问：“老人家，请您说说这个四郎翁堆的‘影子’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说唱《格萨尔》的本领，真的能同四郎翁堆比一比

吗？”

藏族老人又捋了捋他的美髯，两眼炯炯有神：“先不要问他叫什么，也不要问他住在哪里，让我先给你说个关于他的故事吧！”

藏族老者娓娓动听的故事，一下把老辛引进了辽阔而荒漠的千里草原……

那是一个寒冬之夜，大片大片的雪花像撕碎的羊毛一样漫天飞舞。黑色的牛毛帐篷里座无虚席，憨厚、淳朴的牧民们高高地仰着头，聚精会神地聆听《霍岭大战》中岭国英主格萨尔，同霍国三个帐王之一的黄帐王斗智斗勇的故事。演唱者是一位潇洒而又老成持重的英俊青年，他头戴一顶银光闪烁、挺拔威武的格萨尔王盔，身披色彩斑斓的长袍，坐在一块高垫上边说边唱。当他说到，格萨尔调遣以辛巴和丹玛为首的三十员英勇善战的将领，向霍国大举进攻、所向披靡时，忽然，帐篷外的千里草原上隐隐响起了战马的嘶鸣。牧民们掀起了一阵骚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吐吐舌头，交换着惊恐的眼神；那些坐在帐篷口的人们，都不知不觉地使劲往帐篷中间挤。少顷，战马的嘶鸣由远而近，接着，成群的战马踏着草原上的积雪，擦着帐篷的篷布飞驰而过；马蹄的声响震耳欲聋，马蹄溅起的雪团，如同冰雹般地打在帐篷顶上，使帐篷都震颤了……这一夜，听书的牧民们没有谁敢迈出帐篷一步。次日天明，人们走出帐篷散去时，眼前的景象更加使他们惊讶，只见帐篷周围的雪地上，满布着成千上万的马蹄践踏的印痕，宛如格萨尔的铁骑劲旅刚刚通过一样……

听完藏族老人这段绘声绘色的精彩叙述，老辛也不禁咋舌，连忙问道：“您所所说的那位年轻的说书者，想必就是四郎翁堆的‘影子’了，但不知他现在哪里？”

藏族老人点点头，然后说：“他叫巴乌嘎登^①，一个既英武又吉祥的名字；他是属龙的，今年嘛，估计也有四十多岁了。他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沿途要翻三座大山，还有三条横河挡道，骑快马去，少说也得三天时间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这次普查犹如探宝，要是真的能访查到一位造诣很深、技巧很高的说唱艺人，对《格萨尔》办公室的老辛来说，就算是抱了一个金娃娃，翻山过河走三天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藏族老人的话，倒使老辛猛然想到了远在巴黎的法国学者石泰安。为了介绍《格萨尔》这部迄今所知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石氏付出了令人惊叹的心血，根据藏文本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终于在1956年出版了29卷本的《岭地喇嘛教版藏族格萨尔王译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介绍《格萨尔》的外国人。前不久，老辛到日本东京访问，有一天冒雨到浅草地方参观，在金龙山浅草寺附近一家精致的小书店的书架上，他偶然发现了这部由不丹王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史诗。他急匆匆地浏览了石泰安写的《引言》，翻看了全书的设计和装帧，心头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平心而论，石泰安的书说不上很完整，已出的各个说部，同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都还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人家毕竟是成套地出版了！《格萨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伟大的祖国，才是它无可争辩的故乡。可是，到目前为

止，我们还拿不出一套规范化的版本，说来岂不令人汗颜！

由四郎翁堆的“影子”，老辛又想到了荷马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多达一百多万行、一千多万字的《格萨尔》，既然被国际公认为“东方的《伊利亚特》”，那么，说唱这部史诗的民间艺人，不就是一个又一个活着的荷马吗？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到处行吟的盲歌者荷马，是否确有其人，至今仍争论不休，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荷马问题”；而遍布“世界屋脊”上的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们不仅是《格萨尔》这部伟大著作的收集者、传播者，更重要的还是史诗的创作者。只有像淘金一样，把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挖掘”出来，让他们闪闪发光，我们才有可能像国家所希冀的那样，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对《格萨尔》的“抢救”任务。

以后的事，读者诸君自然可以想象得到，老辛用重金雇了一匹快马，顺着藏族老人指引的方向，昼行夜宿，渴饮饥餐，经过整整三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四郎翁堆的“影子”巴乌嘎登。

二

巴乌嘎登居住在仙境般的铁桥村。它林中飞云，云中走山，山明水秀，林静花香，旁边还有条大河蜿蜒而过。说是大河，是指它危崖如削，峻岭横空，其实河面并不很宽阔，属于“隔河能对话，见面要走一天”的自然状况。传说原来在这条河上有一座铁索桥，是明朝时期西藏的大桥梁工程师

兼藏戏创始人，号称“铁桥喇嘛”的汤东杰布修建，因而得名“铁桥村”。历经沧桑，铁索桥早已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一座坚固美观的双拱水泥桥，不过，“铁桥村”的名字却仍旧沿用着。

去巴乌嘎登家，先经过双拱水泥桥过河，攀登一个坡度不大但很长的斜坡，然后便进入猛森森、密匝匝的青桐林。走出青桐林，再沿着一条牛毛绳似的小道缓缓而上，不久便又钻进挂满云雾草，扑朔迷离的云杉林。出生在杏花春雨江南的老辛，读中学时就懂得“曲径通幽”这个词和它的含义，今日却是身临其境了。他听着鸟儿的啁啾，闻着花儿的清香，绕上绕下，攀援前进，也不知走了多久，才看到在一个背阴的山坳里，有个用石块砌起的小屋。

这天，天空出奇地蓝，云朵出奇地白，太阳也出奇地红，一切都显得明朗而又清爽，属于高原上并不罕见的好天气。可是，当老辛跨进这间石头小屋时，却一下变成了“瞎子”，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扶住门框站定，过了一阵子，才模模糊糊地看到，靠墙的一块厚垫上，端坐着一位身体瘦弱的人。不用问，这大约就是四郎翁堆的“影子”了。

主人像半截树桩微微晃动一下，不等老辛说话就先开了口：“辛苦了，远方来的客人，请坐。”

整个屋子没窗户，只有靠屋顶上一个碗口大的天窗射进些太阳光来。凭借这微弱的光亮，老辛仔细地审视着这间仅有六、七平方米的方形小屋。屋子的中央有个十分简陋的火塘，未燃尽的木柴在冒着缕缕青烟。由于长期的烟熏火燎，

房顶和四壁都是黑油油的，像是用黑漆漆过，有的地方看上去似乎还在滴油。主人大有“人性复归”的味道，长发披肩，和头发连在一起的胡须也像乱蓬蓬的蒿草，似乎从来都没有理过发、刮过脸，看上去，足有五十多岁。裹在他身上的邋邋长袍，既破烂又肮脏，连他屁股下面的那块厚垫子，也是千疮百孔，油渍斑斑……

惴惴不安的老辛，同主人面对面地席地而坐，主人死盯盯地看着摆在面前矮桌上的一面铜镜，轻声细语地说：“昨天我就知道你已经来了，还知道你骑的是一匹白马……”

老辛好生奇怪，昨天他到达乡政府时，天已昏黑，当时只和看管乡政府大院的那位耳聋眼花的老阿爸打过交道，别的什么人也没有接触，今日一早就来造访，这些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并且还准确无误地知道自己骑的是一匹白马？老辛立刻意识到，这个不修边幅的人，身上还涂着一层神秘的油彩。他很纳闷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嘿嘿，是它告诉我的。”主人指着面前的铜镜，微微一笑，诡秘地说：“你走在路上的情形，进村以后的情形，我都是在这里面看到的呀……”

真是越说越玄乎，老辛也被弄得如同用土巴^②洗脸，稀里糊涂：难道他的这块宝贝镜子比雷达、电视什么的还要先进？老辛下意识地拿起那个擦拭得油光水亮的铜镜，变换着不同的角度反复观摩，结果，除了自己变形的面庞，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怪呀，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看到呢？”

“那……”主人不屑说下去，看他脸上的神情，似乎在说：“谁叫你是肉眼凡胎呢！”

这些年来，老辛因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他们说唱时，有的紧闭双眼，手捻数珠，有的手托帽子，还有的在脸前平摊一张上面什么也没有的白纸。老辛懂得，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精神集中，“出神入化”，使自己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半昏迷状态，以便即兴创作；同时，也给听众一种神秘之感。不过，他可从来还没有见过，有谁拿铜镜来胡弄人的。仔细想想，巴乌嘎登也许是取笑罢了，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他话锋一转，言归正传：“您知道我为什么找您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巴乌嘎登看着摆在他面前的铜镜，轻轻地摇着披肩长发。

“我是专门来听您说唱《格萨尔》的。”说完，老辛拍了拍背在身上的录音机和装有闪光设备的照相机。

“你找错庙门了，什么《格萨尔》，我一点都不懂……”

“这就怪了，不会说唱《格萨尔》的人，怎么会被人称为四郎翁堆的‘影子’呢？”话虽是这样说，老辛在心中也不免嘀咕：要是真的碰上一个专搞封建迷信的神汉，那可就是自讨苦吃了。

“这是谁说的？”巴乌嘎登显然激动了，但在激动之中又明显地带着点心虚。

“银杏沟的一个老人，一个跛脚的白胡子老人。”

“是他？”巴乌嘎登略加思索，旋即又变得言辞坚决，不容置辩：“这不可能。”

“正是他，千真万确。”老辛对他发起进攻了，“您也肯定认识他。”

“三宝在上，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

从银杏沟到铁桥村的马背上，老辛一连三天想象着将要拜会的巴乌嘎登。根据白胡子老人的介绍，他想，未来的查访对象，一定具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广博的见闻，头脑清晰，伶牙俐齿。万万没有料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这样一个钻在小黑屋里的神秘的怪人！

三

多亏老辛有心计，出发时带了一张载有为《格萨尔》平反公告的藏文报纸，不然的话，巴乌嘎登“金口”不开，老辛他准保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真没想到，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巴乌嘎登，竟有很强的阅读能力。他一口气将报纸上的平反公告读了三遍，边读边思索，读完，把已经揉皱的报纸用手抚平，珍贵地放在面前，又沉思起来。他掏出租劣的牛角鼻烟壶，大口大口地喷着烟灰，小黑屋里一时烟雾腾腾。过了好一阵子，他才似问非问地说：“这么说来，《格萨尔》算是香花，不算是大毒草了？”

“那是自然，公告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哩嘛。”老辛回答。

“既然《格萨尔》不再是大毒草，那么说唱《格萨尔》的人呢，也就不再是‘牛鬼蛇神’了吧？”巴乌嘎登自言自语地说着，“年轻的说书人不会再受管制了，年老的说书人也不会再受折磨了吧？果真这样，那就三生有幸，谢天谢地了！”

老辛默默地点点头，又深情地望了望巴乌嘎登，想说些